

治学与成才之道

主 编 李金池
副主编 刘绍川
覃录辉

民 族 出 版 社

1993 年 5 月 · 北京

目 录

序.....	(1)
林耀华教授答记者问.....	(4)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访马学良教授	(17)
王钟翰教授答本报记者问	(29)
有志者事竟成	
杨成志先生印象记	(37)
坎坷终无悔 志坚功自成	
——访著名民族学专家陈永龄教授	(44)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王辅仁教授访问记	(51)
语言奇才于道泉	(58)
维吾尔语文专家哈密提·铁木尔教授	(67)
机缘·奖掖·勤奋·奉献	
——李森教授答本报记者问	(70)
深切怀念语文专家李民先生	(79)
他在辛勤播种爱祖国、爱民族的种子	
——访藏学研究所所长李秉铨教授	(82)
跋涉学道步不歇	
——访戴庆厦教授	(92)
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	
——忆石钟健先生	(99)
深入浅出 不拘一格	
——记王恒杰教授.....	(101)

教学、科研、治学是统一体	
——访李松茂副教授·····	(109)
顾肇基教授答本报记者问·····	(116)
他在沿着陡峭山路攀登	
——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所长施正一教授·····	(123)
成功之路	
——访全国优秀教师黄万纶教授·····	(132)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访马列主义教科部王炳煜教授·····	(140)
为建立新学科默默奉献的人	
——访刘锴教授·····	(150)
崇高的信念 执着的追求	
——访我院教授张克武·····	(159)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访汉语系裴斐教授·····	(169)
他为藏族文学研究留下珍贵遗产	
——佟锦华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	(176)
历尽艰辛天地宽	
——访壮族教授梁庭望·····	(186)
踏遍青山情满怀	
——访图书馆吴丰培研究馆员·····	(193)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见金	
——访著名二胡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陈振铎教授	
·····	(200)
陈兆复与中国岩画·····	(207)
他为各族人民献真情	
——记著名满族书法家关东升教授·····	(211)

青春无悔自扬歌	
——糜若如副教授逸事·····	(217)
做人·做事·成就	
丹珠昂奔副研究员对科研工作的感受·····	(225)
班班多杰副教授所走过的路·····	(231)
园丁的情怀	
——访满达副教授·····	(240)
教书乐 育人乐	
——访罗小伟副教授·····	(246)
他给我们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数学系副教授吴良大·····	(252)
我们需要把课讲活的老师	
——对马绶炳副教授教学的思考·····	(255)
推荐一篇值得一读的论文·····	(260)
委属民族学院师资队伍现状	
分析及对策研究·····	(261)

序

1990 年始,院《周报》开辟专栏,以专访、特写等形式,介绍了我院 35 名教师的治学与成才经验,反映甚佳。学生们期盼更多地了解老师,学习老师。举凡老师授业、解惑的好经验、好方法,尤其老专家治学的成功之道,无论综合性的内容,或突出某个角度、某一侧面的内容,都受到欢迎和重视。专栏开辟之后,《周报》接到许多建议,希望编辑成册,广为宣传。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 35 名同志,是我院教学科研队伍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他们之中,有的已届耄耋之年,依旧搏击在本职岗位上,似春蚕吐丝,绵绵不尽;有的在讲台上辛勤躬耕几十年,不幸已作仙古,离我们而去;有的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或本学科领域的权威,被学生交口称赞;有的是后起之秀,被遴选为北京市青年学术带头人。他们和更多的尚未见诸报端的老师,是我院教学、科研战线上的拓荒者和铺路人。中央民族学院 42 岁华诞,每一步都有他们创造的业绩,每一天都有他们挥洒的汗水,每一课都有他们灌注的心血。这好比铁匠铺里烧得很旺的炉火,熔掉了铁条上的杂质,铁质就变软了。等到它纯化时,再对它敲打和锻压,然后又用清水淬火使它再度硬化,达到炉火纯青。每个学生在老师手里的经历也是这种同样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事业同民族教育融为一体,他们的精神永远在民族学院闪光。

今日中央民族学院,已由建校初期的培训政治干部和翻译人才,变成为一座以文科专业为主体,民族学科为特色,现代科技为先导,文、理、艺、管兼备,教学科研相结合,多层次、多规格、综合性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学。同时也是国家承认的一所重点民族大学。它

的未来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希望与契机。

为此书写序,我心潮难静,万感纷来。我不仅曾是教师中的一员,这当中有不少长者便是我的尊师。我所获取的知识,同他们的谆谆教诲分不开。求学时期,一位师长曾说:人不应该象蚂蚁,只知收集;也不可象蜘蛛,只从自己肚中抽丝;而应该象蜜蜂,既采集,又整理,这样才能够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他是比喻做学问,要勤读思考,还要善于实践,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不倦的钻研,透过各种表象去观察事物的本质,学问才做得扎实。因为在泥土下面的最深层,才能发现金刚钻。

做学问,除了靠自己的努力,拜什么样的人为师,至关重要。“庸匠误器,器可他求;庸妇误衣,衣可别裁;庸师误子弟,子弟可复胚乎?”一个手艺不高明的工匠把家俱做坏了,还可请别人再做一件;笨拙的主妇把衣服缝制坏了,还可请别人再做新的;而平庸的教师耽误了人家子弟,难道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此乃金石之言,掷地作铿锵声。人民教师,肩负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栋梁之才的重任。为人师表,必须身体力行,从做人到做学问,堪称楷模,方能使学子受益终生,永志不忘。

我的那位师长,在他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生命之杯里满注着多少不同的酒液呵!明知有困难,毫无畏葸之心,生活清苦,却洁身自好,外界多干扰,仍潜心于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教育奉献了他的人生年华。我多么希望他青春久驻,生命不衰,以他博大精深知识,传授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用他生命的光和热,点燃熊熊之火,使世界变得更加灿烂美好。但生命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当青春光彩已然从他的脸上消逝,两鬓布满了飞雪,深深的鱼尾纹在他的眼角上明显的表露出来,我确实感到,人生的接力棒,应从他的手中传递给后生晚辈了。这是生活规律,也是自然的交替。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的这位师长阅历深,知识广,老骥伏枥,壮志不泯。他

说把位置让给年轻人,将重担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早日挑大梁是一个长者责无旁贷的义务。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希望后来人超过长者。他从讲台上退下来,在科研领域却不会退下来,要奋发有为,老而弥坚。委实是为人师表者的坦荡胸怀。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有句名言:“有些人的生命象沉静的湖,有些象白云飘荡的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些象丰饶的平原,有些象断断续续的山峰”。这湖泊、天空、平原、山峰,寓意着永恒,也寓意着神圣、奥秘、博大与崇高。它们象征的生命,自然包含着同等的意义。教师的职业是为社会造就人才,人类要生存发展,国家要繁荣进步,知识要积累更新,都铭刻着教师不朽的劳作和功勋。教师者,桃李满天下,无处不弟子,弟子之中有弟子。这就是生命和事业的延续,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结束本文时,祈望《周报》的同志片笺片玉,止于至善,将更多教师的优秀成果供而奉之,以弘师道,以飨读者。

李金池

1993年2月

林耀华教授答记者问

——对大学生和青年教研人员

谈成才、成功的经验和条件

本报记者 刘绍川

记者：林先生，您好！我院很多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或青年科研工作者）都很想从老前辈的发展经验中得到一些加速发展自己的启示。您作为院内外、国内外的知名学者、终身教授、专家，我们《周报》想请您结合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做学问的经验，向我院各族大学生和青年教研人员谈谈有关个人成才、成功的经验或条件。

林耀华教授：欢迎记者同志来访，首先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周报》的读者，即本院的全体同学和教职员工致意，祝大家在新的学年里取得新的成绩。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把这句古语用到我的身上，那就是“三句话不离教学”，“三句话不离民族学”。下面我就借用贵报的采访，谈谈我的教学体会和我的民族学研究生涯。为了防止人老话多，谈得漫无边际，我还是沿着一条主线来谈。这条主线就是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主要特点。概括说来，它包括以下五点：

（1）一辈子教书，诲人不倦。我今年 81 岁，如果从 22 岁大学毕业留校做助教及研究生算起，我的教学科研生涯就快有 60 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始终注意勤勉敬业，每教一门课，每讲一堂课都要认真地做准备，从没敷衍过。回首往事，我对此是

感到自豪的。数十年来，我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其中成功、成名、成家、成才者甚多，不少人已成为本学科及有关学科里的教学骨干和社会活动家，这使我感觉到了锲而不舍地从事教书育人的神圣事业的莫大满足。每当我的学生们做出了成绩，对党对国家做出贡献的时候，我也分享到了他们胜利的喜悦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快慰。这60年如一日便是我的经验。

(2) 教学与研究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我的教学内容，除了一部分基本理论系借鉴之外，其余都是亲身调查研究所得的成果和体会。几十年来，我把自己搞的种种调查和研究加以总结进行讲授，可以说是自成一套体系了。仅就实地调查而言，我已走过中国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还作为学者访问过香港和澳门。在这些地区里，我国东北部和西南部是我的调查重点，家乡福建也曾是我的一部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的研究》(1935)和《金翼》一书(1947年伦敦英文版，1989年北京三联书店汉译版)做过调查研究的地方。以上述各地区的调查和研究为基础，我主编过两部教材，自认为都是本学科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两部教材就是《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和《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由于这两本书都是师生合作写成的，所以也算是我长年教学的见证吧！透过这些经历，我感到尽量使自己的教学内容同国情结合，同实践结合，同研究成果结合，也是促使我们教与学成功的动力。

(3) 以事业为重，抓学术梯队建设。自投身教育以来，我先后在云南大学、成都燕大、北平燕大、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最终在中央民院形成了以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为基地的一支较为健全的民族学学术梯队。屈指算来，构成这一梯队的主要成员有陈永龄、宋蜀华、王辅仁等教授、副教授约20名以及讲师、助教等许多人才，可以说阵容是相当严整的。当然，这样一支梯队的建成，首先是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民院历届领导悉心经

营的成就，我只是尽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但作为经验来总结的话，我要特别强调不惜心血地经营学术梯队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也是衡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成绩的重要尺度。同时，为了民族教育，为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大计，我希望各级领导和各位同仁继续在这支学术梯队的巩固、发展和提高水平方面给予关注。

(4) 学习新理论，涉猎新领域。解放以后，我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将这一新的理论武器用于指导研究实践，做出了一些成就。这一过程可以从我1951年出版的《从猿到人的研究》那本书算起。此后，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加了民族识别工作、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有时作为带头人，有时作为教师，有时作为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无论以什么身份出现，我都注意把新学的理论运用到研究实践中去，用新的理论指导自己在新的学术领域里的研究。根据这一体会，我认为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的头脑和探索的精神，随时准备接受新的科学思想和进入新研究领域，也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重要条件。

(5)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自己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一些特长，供同志们参考，也希望能对当代大学生们有所启迪：

第一，注意学科的全面性。民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所研究的对象乃是民族以及各族社会文化，这就包含了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在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特别注意把人类学（主要指体质方面）、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与民族学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钻研。例如，我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通论》就都具有这一特点。全面和综合的研究使我避免了许多失误和缺点。

第二，在全面中求独特。这即是在广博中求精深。我在不断拓展自己对民族学诸方面知识的同时，一直注意在两个重点上下功夫求精求深，使它们成为我在本专业中根基最深的立足之地。这

两个重点，一是原始社会史，二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亲属称谓和家族制度。关于原始社会史已获得了国家三项奖状，我在此就不讲了；只是想对亲属称谓和家族制度的研究略说几句。亲属称谓和家族制度是从摩尔根以来的传统核心课题。继摩尔根之后的学者以英国里弗斯（W. H. Rivers）最为著名，后来他的继承人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发展了摩尔根和里弗斯的研究，形成了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来华讲学，我做他的助教，也因此而学到了他的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对中国汉族的亲属称谓和家族制度的研究，经他指导勾画并绘制出汉族自古以来跨九代的“父系家族亲属称谓表”共五幅（参阅《民族学通论》370页），并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赞赏。有了这种功底，我在《金翼》一书写作中就有所表现。后来在调查凉山彝族和四川理县的四土嘉戎（现已识别为藏族的一支），除调查报告外，还独特发表了两篇专文（英文）关于彝族和嘉戎的亲属称谓制度。今天在这里谈起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我觉得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嫌薄弱，而我所研究出的成果已丢失过半，我对此很感痛惜，希望同学们尽早上来接力，以图薪尽火传；二是要说明一个学者，除了本学科的一般知识和发展动态之外，还应有一两手“绝活儿”。这既有利于个人立身处世，又便于自己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

第三，注重基础知识体系的完善和传播。这里主要指的是民族学基础的基础，也就是民族学的学科框架和研究的基础知识部分。国内虽有很多学者出书或写文章讲述民族学，但在科学体系的完整性方面总是有些欠缺。我注意到这些问题，采用了以中国的学科体系为主，兼收并蓄欧美及苏联的研究成果的办法，自认为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例如，在新出的《民族学通论》中，我就注意吸收了苏联在经济文化类型（文化生态学）方面的理论成果。此外，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原著中的本意以及新科

学的发展，订正了苏联学者把“原始群”误认为是“原始人群”的不妥提法，改变了原始社会的两阶段分期法，提出了三阶段的分期法。我认为这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实际进程的。还有，我注意到在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存在着两种学术传统。南方的人类学传统主要承袭的是英美的学科体系，对欧洲大陆特别是苏联和德国的民族学传统似乎认识得不够。北方民族学传统中，也有学者只注重苏联民族学体系，而对英美的人类学不大予以注意。（以上所提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两词，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学科，“民族学”一词即是蔡元培于1926年从德文移译而来，以区别于人类学一词，这个词在欧陆专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大体等同于英美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一般只说人类学，在体质方面的研究，需专提体质人类学）。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失之偏颇，同时也不利于形成中国的学科特色。在新编的《民族学通论》中，我们兼顾了两种传统的长处，但主要的力量还是放在中国特色和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上。这也算是一点创新的努力吧。

关于我自己，今天就讲这么多。讲到个人成功成才的经验和条件，我以为一是打好基础，二是锲而不舍，三是与人为善。当然，这里还应该讲社会条件。在这方面，我认为祥和的气氛以及必要的秩序和公开平等的竞争机制是催人上进和促使人才脱颖而出的起码条件。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创造了这样的条件。

在这里我还要说，不仅在校师生同我合作给予了我帮助，许多离校毕业生经常回访座谈，他们成功的经历对我也提供了学术上的启迪作用以及情绪上的无限快乐。

以上的自我介绍太长了，现在我回答您提出的具体问题。

记者问：林先生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仅在学术上有不少成就，而且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请您谈谈，您是通过什么条件从一个旧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

林耀华教授答：我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已在目前由英文译成汉文的《金翼》一书中做过较详细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书中的小哥或六哥这个人物的身上看出我的身世。30年代末，我出国留学四年，1941年回国，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书一年，1942年转到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代主任，时年32岁。后来的连续三个暑假，我都带学生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康北甘孜藏族地区和川北四土嘉戎人地区，去做实地调查工作。1946年燕大在北平复校，我回到北平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

的确，我在解放前所学和所教的主要是欧美各个学派的内容。当时我是个旧知识分子。但是我还有几点不同于当时一般教授的地方，也许是这些不同之处构成了我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1) 我的教学比较注重联系实际，注重社会调查，讲真实情况，不尚空谈，不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作宣传。所以，我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如《金翼》和《凉山彝家》（有英译本）到今日仍可用。1982年我重访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从西到东得知许多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还将以上两书列入学生的参考书目中。

(2) 我与学运有过一些关系。我在成都教学时，曾应进步学生之邀，参加过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的活动。1946年回到北平燕大，这种关系更为密切。当时我住燕东园31号，我的妻弟作为学生寄住我家。他是抗日时入党的共产党员，经常在我家开支部会。我所在的社会学系和我爱人饶毓苏教授所在的经济学系的进步学生开会也来我家。因此，我家客厅和饭厅晚间经常都有学生团体在开会。这是我接受新思潮，协助我党地下工作的起点。

(3) 坚持不同国民党发生关系。1942—46年，我在成都燕大任教时，校系两级首脑都参加国民党，许多入了国民党的同事也百般劝我加入，我都拒绝了。北平解放前夕，由于我家是燕大地下共产党员聚会和藏匿宣传品的地方，因此曾被国民党军警查抄。

我的住所是整个燕大被抄的三户教授住所之一。

(4) 北平解放前后的情况。解放前夕，地处西郊的清华、燕京两大学提前两个月获得解放，我曾参加迎接解放军并邀请部队领导到燕大礼堂作报告。1949年1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和爱人饶毓苏曾作为进步教师双双应首先入城的解放军高级领导人之邀，出席北平各界约500人的会议。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我也曾率领燕大社会学系师生50余人组成的小组躬逢盛典，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自豪和欢呼。

(5) 解放初期的工作。解放后我感到心情舒畅，情绪振奋，因此积极追求思想进步，不遗余力地苦学苦干。苦学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出《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受到翦老伯赞（老共产党员）的称赞并为之作序；苦干就是听从党的召唤，投身于教学、科研和社会调查的各条战线，埋头苦干，不计名利。1950年夏，我率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社会学系毕业班同学，到内蒙古自治区做调查实习工作。1952—53年随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进过西藏。1954年率本院研究部14位研究人员到云南协同傅懋勛教授的语言组派出的成员以及云南省民委干部和云大的一些师生，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利用半年以上时间从260多个自报的族称中识别出22个单一民族，上报之后均获国务院批准。（参见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载于云南省编辑组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7—58页，1987年版）。1956年5月，我应邀到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全苏民族学会议”，是那届会议上的12名国际代表之一。我代表中国学术界在开幕式大会上作为第一个国际代表发言，题为《当前我国的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该文载于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主编的《苏联民族学》季刊当年第3期上）事后，苏联朋友们告诉我，

中国的民族学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做出了杰出的成绩，给新中国争了光。

上面所说的是我从一个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转变的主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解放后欣欣向荣、人心向党的形势，是党的教育、帮助和感召。当时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为我们加入党的队伍敞开了大门。特别是中央民院各级党组织对我都非常关心，从各方面对我加以引导、教育和帮助。所以我于1956年下半年申请入党，民院党委批准我作为本院的第一个教授入党。这就是我从旧知识分子转变成共产党员的简要原因和过程。

记者问：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他们把学习马列与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对立起来。林先生作为一个有名望的终身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林耀华教授答：这个问题听起来很严重，情况是否如此，我不太了解，所以也不便多谈。我看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由了解青年学生情况、知道学生们真实想法的老师们来谈，以便消除误解。我自己作为党员和民族学专业的老师，当然也关心学生们的思想进步，但我能够说的，只是自己的个人感受。从我本人专业思想的进程和追求进步的道路来看，我感到情况是恰恰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后半生的思想进步和学术成就都起到了积极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从猿到人的研究》，还有1962年发表的《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参见《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论文选》1951—1985，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都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后者还是我深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原著并比较了德、俄、英、法等文版本之后才写出来的，迄今还常被学术界引用。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也不隐瞒这一点。我参加过许多次学术会议和讲学活动，访问过

苏联、美国、英国、墨西哥、日本、印度、菲律宾、泰国等，宣读过和发表过不少论文，这些成果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各民族以及它们社会、文化和事物发展的本质的理论，因而是科学的真理。就我所知，目前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也在涌起一股很强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思潮。例如，我就看到美国1987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题目是《美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视野》。我还知道一位叫马文·哈里斯的学者把他所创立的研究方法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他自己就曾在好几个场合里讲过，他的这套方法完全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产生的。

因此，我认为扎扎实实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学好马克思本人的原著，对于个人的思想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样地大有好处的。重复说一遍我的感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个人思想和学术发展是有积极的启发作用的。

记者问：现在有些人只责怪自己的国家穷，自己的民族落后，缺乏为改变这种状况的雄心壮志。有些大学生和有些青年教师、青年科研人员，把出国深造、在外工作看成是最高的愿望和理想。您是留过学、出过国的人，请您对此谈些看法。

林耀华教授答：中国的贫穷和国内有些民族地区的相对不发达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同学们对此有所认识是件好事，这也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一种表现。但不应该由此而怨天尤人，而应该促使我们振作起来，警醒过来，奋起直追。当我们在问祖国和家乡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的时候，同时应问问自己，我该给祖国和家乡提供些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至于大学生、青年教师和青年科研人员有出国深造的要求，如果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立的雄心大志，我是很赞同的，这也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为了鼓励有志青年出国深造，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专门制订有一系列的政

策和规定，甚至设有一些基金项目，这是我们各民族的优秀儿女应该努力争取运用的。中央民族学院不仅应该成为各民族优秀青年学习和深造的学府，还应该成为向国外各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派遣优秀学生的基地，以便他们早日学成归来，服务国家，造福乡梓。

作为以前出过国、留过学的人，我首先要说出国学习和深造对提高我的业务能力、开阔我的眼界、扩大我的交往范围、启迪我的思路等等，都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也希望让尽量多的各族优秀青年通过公开平等的考评，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

但我同时要讲的是，出国留学并非是唯一的成才或成功之路，也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志。我从事教学科研近60年，所教的学生中成名、成功者不在少数，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在国内成才、成名的。试举同我经常有往来的几例，如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北京体育学院老院长柯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学位评议组成员蔡美彪、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部领导人宋兆麟、宁夏社科院研究员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西安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民族史家阮大荣、四川民委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民族学家李绍明、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民族考古学专家汪宁生、河南郑州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地专家戴可来等等。就眼前而论，本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两位博士生导师陈永龄、王辅仁，都是在国内从事教学科研多年、功成名就之后才走上国际学术讲坛的。他们在国外讲学还很受欢迎，这说明立足国内也是一条畅通的成才之路。

此外，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论，出国留学也有颇多难处：去国怀乡之情、寄人篱下之苦、受人歧视之痛都是活生生的，至今仍觉历历在目。我这样讲是希望有志于出国深造的同学和年轻同事们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也是希望国内的同学和同事们理解出国留学的人们的难处，给他们以应有的关怀和体贴。

记者问：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在